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7)

总第18卷

王立胜 胡家勇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7)

总第18卷

王立胜 胡家勇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7 年. 第 1 卷: 总第 18 卷/王立胜, 胡家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3 - 0465 - 8

I. ①中… II. ①王… ②胡…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12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84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学术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金富	王立胜	王振中	王维国	卢现祥	朱方明
朱恒鹏	任太增	任保平	刘秉龙	齐 兰	纪玉山
杜曙光	李 政	李 涛	杨春学	邱海平	邹 薇
沈坤荣	宋丙涛	张 平	张 宇	苏 剑	周云波
周 文	周 冰	赵学增	胡亦琴	胡家勇	侯风云
洪名勇	宣 烨	钱 津	徐丹丹	高友才	黄茂兴
程恩富	景维民	董长瑞	韩 鹏	焦方义	谢 地
蔡继明	裴小草	裴长洪	樊 明		

目 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王立胜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属性探析	于金富 (15)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科学还是研究利益 关系的科学?	侯风云 (30)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驱动理论	裴小革 (45)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 现状、认识、创新、发展	
.....	白永秀 吴丰华 (6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胡家勇 (87)
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及其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景维民 倪 沙 (102)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缘由 ——基于政治和法学视角	程承坪 (113)
按比例发展规律及其实现机制	段学慧 武建奇 (127)
“良方”不能缺“药引”: 公用事业市场化与公共管理 改革协同发展	任晓聪 (147)

[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中国经济下行的“制度换挡”思考 卢现祥 李小平 (161)
-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及其化解 王秋石 万远鹏 (178)
- 自由贸易、创新与经济增长 魏 枫 焦方义 (192)
-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效果总体评价
——基于2003—2014年增长率视角 和 军 樊寒伟 (208)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 洪名勇 洪 霓 (219)
- 教育贫困为何不降反升
——基于教育投资、工作经验回报的
实证分析 邹 薇 程 波 (229)
- 公共服务提升了居民幸福吗?
——基于CGSS 2010微观数据的分析 宣 烨 张文武 (259)
- 精准扶贫的经济动力意义及对策
——基于甘肃的调查与思考
.....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精准扶贫课题组 (285)

[附录]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八届

- 年会综述 胡家勇 齐 兰 (3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王立胜

摘 要 中国经济的崛起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不同视角、不同立场、不同结论的国际解释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试图影响甚至引导中国的实践。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话语权之争,就是中国所面临的主义之争与道路之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表明在当前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掌握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总结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指明未来方向。同时,只有直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紧紧把握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会有其生命力。因此,坚持问题导向,重启 20 世纪 90 年代指导经济“软着陆”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政策研究,既是历史的承袭,也是时代的要求。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更需要在解读中国、引领中国的理论竞争中形成战略定力,把好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定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前条件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国际话语权 中国奇迹 中国道路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建设的初期成果。

[作者简介]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wanglisheng1963@126.com。

一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下提出,体现了其特殊的时代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使命在于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应对经济“新常态”等现实问题的政策原则,把握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道路。保持道路选择的自主性,要求掌握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形成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政策的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之所以在当前条件下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当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掌握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建立指导中国发展的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意义在于我们以自己的理论解释中国问题与中国道路——如何解释,关系重大——对过去30多年改革和发展道路的解释,既关系到对以往道路的定性,更关乎对“当前是什么主义”的回答;对现实问题的剖析,既关系到当前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关乎未来方向的历史抉择。一言以蔽之,话语权之争也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王伟光,2015)。从“政治经济学”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内涵与外延,都一次比一次更加明确和具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党中央在这个时候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就是针对当前国内外的现实状况,打造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体系,以期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厘清思路、分析问题和指明方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具体而言,总结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和指明未来方向,都涉及中国道路的学术话语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也具体表现为这三个方面。

二 总结历史经验：中国成就的话语权之争

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 30 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使“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的某些学者又试图将中国经济的成功解释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从而兴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其实质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话语权之争，而话语权之争，归根结底，又是主义之争与道路之争。

（一）“中国奇迹”与西方学界的话语转换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建设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看好。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欧美在意识形态领域抛出了“欧美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和“21 世纪共产主义将在历史上消亡”三大预言，并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了“中国崩溃论”等新论调，试图唱衰中国。^①1994 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 1994 年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质疑亚洲国家的发展成就，并一再抛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在过去 30 多年反复出现，不绝于耳，既表明西方对中国实力上升和自身实力下降的焦虑，也体现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意识形态霸权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梁玉春，2015）。

然而，中国经济过去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被世界公认为 20 世纪的历史性事实，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经济的崛起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的转移。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转向了亚洲，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在亚洲崛起为世界经济引擎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最为重要——与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经济体量大且持续时间长。同时，中国奇迹也令那些笃信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备感压力——对于中国未遵循“华盛顿共识”而取得的成功，他们迫切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巨大成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面

^① 《西方预言缘何落空》，《人民论坛》2016 年第 9 期。

对这一问题,西方世界话锋急转,转而承认“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并争夺其理论解释权,试图将其解释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唐晓(2010)总结了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评价话语的转变:欧美媒体首先对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困惑,在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又开始高度关注“中国模式”问题。

“中国崩溃论”反映了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意识形态霸权,关于“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话语转换也出于同样的意识形态考虑——其意图非常明显:如果中国经济改革失败,那是因为没有遵循普适的新自由主义路径;而中国的成功也正是由于遵循了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中国模式”的话语权之争

中国以自己独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中国的经济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崇尚的“华盛顿共识”,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与苏东国家遵循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中国的经济开放模式也与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同。但是,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结果,在理论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即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自我完善的成功,还是新自由体制在中国实施的成功。与之相对应,之前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西方主流学者普遍将中国模式归结为市场经济与政府主导的结合,或自由经济和威权政治的结合,往往将之与某种“资本主义”模式联系起来,如“威权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轩传树,2011)。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著名左翼学者大卫·科茨(2014)除指出一个积极主动的政府的重要作用外,还突出强调了渐进式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在中国模式中的重要地位。肖恩·布雷斯林(2012)主张用“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的概念理解中国模式,认为李斯特的发展型国家表明了中国模式、以前亚洲的国家发展主义模式与更早的欧洲和美国的国家主导型发展体制之间的连续性,“不是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来思考,而是讨论中国特色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或许是更正确的做法”。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森(2012)提出了新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三个方面

更新了发展模式——创建“国家级冠军”品牌，推动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提高治理水平和增加公共产品。针对西方世界围绕“中国模式”的激烈争论，布雷斯特林总结道：“中国模式”之争无非是话语权之争，“‘中国模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言语行为——以特殊的方式对其进行谈论和定义，使它变得真实，并赋予其真实的力量”。有学者（陈曙光，2014）概括，西方主流和非主流学者将中国模式解读为以下五种：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第三条道路”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后社会主义模式。

国内学者也参与到这场话语权的争论之中，尝试为中国奇迹提供贴合中国国情的解释。杨春学（2012）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动力是竞争，其特点是各级政府的横向、纵向竞争与无数企业的竞争交织在一起；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迫使政府与企业采取了合作行为，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张宇（2008）认为，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道路的概括与总结，其主要内容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贯穿于其中的核心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既有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的特点，又是一个处在不断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概念，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体现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和制度要求。徐崇温（2010）认为，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多次提到中国模式，其着眼点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中国模式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可供别国借鉴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中国模式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郑永年（2009）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讨论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他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经济发展对最低限度社会政治秩序、有效产权保护和基本社会正义的需求，以及民主化所需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等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的政治模式，认为从经济上看，中国模式为复合型或混合型经济模式，可以从混合所有权制度、出口导向和内部需求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个方面概括中国的经济模式。

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争论，其实质是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话语权之争。就中国自身而言，无意于甚至排斥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但是，不同的话语权体系正在争夺关于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的解释

权——并在当下发展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中国问题和现象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发如此广泛的国际学术讨论。这些话语权之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国际学术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虽然并不同意使用“中国模式”等具体范畴，但中国必须在理论上回答自己的经济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胜利还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这已经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说明中国开始直面这一理论问题，要求用自己的理论做出明确的回答。

（三）“主义”之争就是“道路”之争

关于过去成绩的主义之争，不仅是解释权之争，也关乎对当前主义的判断。作为指导我国改革的经济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等重大原则，确保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①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宣扬自己的主义。

关于过去成绩的主义之争，也是关于未来方向的道路之争。是什么铸就了中国奇迹也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依托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背后需要中国独立的话语权，而话语权背后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三个自信的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② 可以说，当前面临的理论问题不是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要不要上升到理论层次，而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正在国际范围面临不同主义、不同导向的理论解释。如果不形成自己的理论，我们必然会在现有各

^① 《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7月1日。

种理论的解释中失去话语权，甚至有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迷失方向的危险。

三 解决现实问题：中国问题的解释权之争

什么铸就了我们的成就，将决定我们在发展中要依赖什么；什么导致了当下的问题，则决定了我们在发展中要变革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不仅要完成对历史成就的定性，更需要回应对当前问题的破解。换言之，既要解释我们过去的成就是怎么得来的，也要回答我们当下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就需要强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并弥补其政策研究的不足。

（一）强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① 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一直都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特征。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顾海良（2014）认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出发形成问题意识，再由问题意识到“问题倒逼”，是解决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和经济改革的路径，也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特色。不难发现，习近平重要经济思想的历次提出，往往都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转变，我国也正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等现实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做出我国已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判断，为我们制定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正确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针对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资源和环境压力加重、增长动力机制亟须转换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判断,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为我们化解过剩产能、拉动消费需求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政策思路。

同时,改革过程中各类问题的积累也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中国的改革以实践为导向,遵循先易后难的渐进式道路。这导致改革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积累和逐步爆发的过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如双重体制摩擦、腐败加剧、国有经济改革滞后等。”(张宇,1996)习近平强调,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改革越到深水区,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必然会越多。当前阶段,这些深层次矛盾的主要表现就是长期的高速增长面临结构性调整所伴随的增速放缓问题,以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难以持续和升级“瓶颈”的难题。当前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外在表现。化解相关矛盾,需要继续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创新。因此,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理论问题亟须政治经济学做出回答。其中,经济增长方面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更为紧迫。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领域开始引入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学的政策思路。然而,面临当前的结构性问题 and 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次矛盾,凯恩斯主义等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难以给出有效的理论解答;把握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新常态,越来越需要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理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境遇也表明,对于现实问题的逐渐“失语”,以及政策研究的相对不足,是政治经济学日渐“式微”的关键原因。当然,长期沿用的西方理论已经难以有效地解答中国问题。就当前现实而言,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没有现成的理论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而是求助于西方政策理论的传统思路已经走到尽头。把握现实的经济增长,急需政治经济学做出相应的理论创新。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指向,也是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强调以政治经济学把握经济规律的原因所在。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and 有效办法上来。”^① 党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就是要我们聆听时代的声音和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二）补足政治经济学的政策研究“短板”

我们也应看到，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领域弥补政策研究的不足。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而言，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制度创新与道路抉择过程中的指导作用非常明显。例如，改革开放后，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讨论，逐渐取得了正确认识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张卓元（2009）总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过程，突出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对改革实践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对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起了先导的作用；其次围绕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关于“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的争论最终明确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议题，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理论相对较少，导致这一领域的理论创新明显滞后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实践，使政策实践越来越借助于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理论。当前阶段，沿用西方经济理论所遭遇的“瓶颈”反过来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补足自己在这—领域的“短板”。这也是在当前背景下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具体理论相对较少，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研究也并非一无是处。在这—领域，我们也曾取得突出成就。1996年，中国经济宣布成功实现“软着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研究所以刘国光为首的经济政策研究团队对经济“软着陆”的政策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之前,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1993年7月6日,刘国光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一文,针对过渡时期我国经济新旧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依然存在和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的总态势尚未完成的特点,探讨了过渡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问题。他指出,要协调好国家计划、财政和金融这三个宏观调控的支柱,“在对三者关系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在《论“软着陆”》一文中,刘国光(1997)提出了及时削峰、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和抓住主线的政策思路,为具体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基本参考。

刘国光的“软着陆”理论得到了理论界的极大肯定。《论“软着陆”》一文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称赞为“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经济学动态》杂志在纪念刘国光八十寿辰的文章中指出:“他的理论成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也就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享有盛誉的著名经济学家。”^① 2013年11月26日,在“庆祝刘国光九十华诞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讨会上,近百位专家对刘国光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我国理论界集中讨论1988—1995年中期改革的思路时,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提出的‘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以刘国光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多次被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并成为我国在制定改革和发展规划时长期坚持的总基调。”(张福军,2014)

1996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实际上标志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者,开始从制度和道路选择的重大问题逐步转向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领域。然而此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开始全面转向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学的政策理论,社会主义

①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简介》,《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1期。

经济理论的政策研究未能继续下来。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可以视为是另一场经济“软着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内政治经济学界重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政策研究既是历史的承袭,也是时代的要求。

四 指明未来方向:铸就战略定力,把握前进方向

如何看待过去成就,如何解决当下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一点:如何选择未来前进的方向。当前条件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总结过去成就、解决现实问题的话语体系,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基于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铸就战略定力,把握发展方向。

(一) 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①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需要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侧重点并非仅仅在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而是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政治经济学的优势

^①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12月26日。